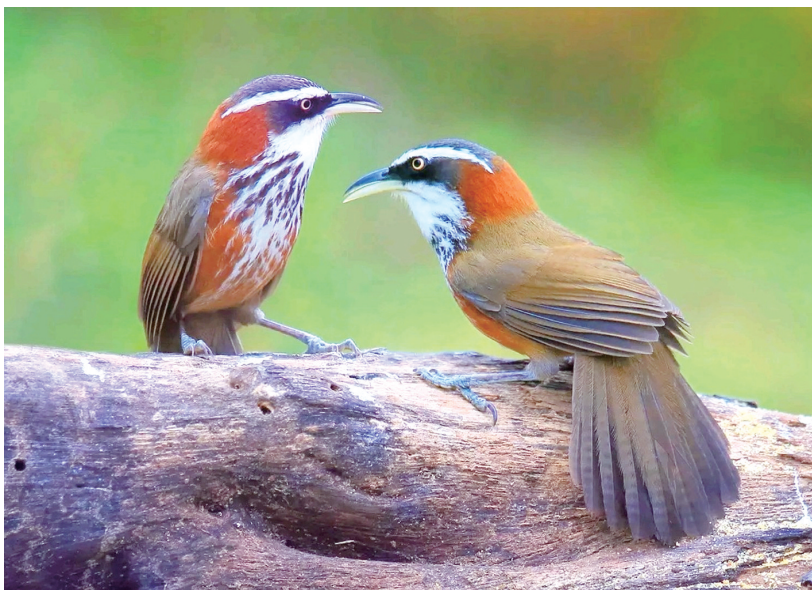


鸡鸣声声

鹰之歌



情语 周文静 摄

每每梦到深处，总能隐隐约约听到远处传来雄鸡报晓之声。黑夜像潮水一样在鸡鸣声中退去，和煦的晨光从山的那边喷薄而出。这声音如一首忧伤的歌，从儿时的故乡，穿越时空隧道，在我心灵的天空久久回荡。

鸡鸣声声——这声音，让我想起那个自强、奋进的少年。

1960年代初，我出生在大别山腹地的小山村，穷山恶水，山民生活十分不易。从我记事起，我们家就是全村起得最早的人家。父亲说过，一个家庭，连早起都做不到，那一定是衰败的前兆，早起的家庭才有希望，才会兴旺发达。耳濡目染，我们兄弟几个也都“闻鸡起舞”，帮家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活。

我稍微长大了一些，每逢周末，都要到生产队与社员们一起参加劳动，印象特别深的是早起拔秧苗。

全村的鸡都叫起来的时候，生产队长也像大公鸡一样在村头喊了一嗓子，大家就纷纷下了水田。年轻人都下到一个田里竞赛，看谁拔的秧苗最多。拔秧苗是插田的序曲，也算是技术活，拔秧、去泥、整理、打捆，每一道程序都不可少，既要熟练，还要讲速度。父亲曾手把手教过我，我虽用心学，还是练得很苦。

一大早，水田里特别清凉。一脚踩进泥水里，身上不禁打了个颤。但我顾不了那么多，低头弯腰一干就是个把小时。我暗下决心，一定要争得第一。干了近两个小时，累得我腰酸背痛，汗流浹背。功夫不负苦心人，正常劳力一个早晨可以拔两百来个秧束，而我却拔了三百多个，在年轻人中自然是拔得头筹，社员们也竖起了大拇指。这小小的成功在别人看来也许不值一提，却让我倍受鼓舞，这种不甘落后的个性，也给我以后的人生注入了百折不挠的韧劲。

1990年代前后的农村，能够确保三天吃一次红烧肉的，大抵是吃皇粮的乡村教师或做小生意的商贩。身为孩童，我站在黑白电视机前，看着包大人义正词严地亮明心迹：“一日三餐，哪怕粗茶淡饭，亦可。”每看到此处，望着碗里的白米饭和干巴巴的青菜，我对红烧肉的渴望更深了一层。没有荤油的饭菜，食之无味。

由于严重的营养不良，我得了疳积，瘦弱的身体，顶着大大的脑袋，样子很吓人。那时爷爷是做塑料袋批发生意的小贩，经济相对宽裕。作为长孙，我偶尔会获得一项帮他买肉的美差。1990年代，猪肉七块钱一斤，每次爷爷会很得意地从兜里掏出十块钱，让他的大头孙子跑两里路买肉。我打着赤脚，一路小跑，赶到猪肉摊。卖肉的叫老丙，长长的脸，从侧面看，像极了他手中的分肉刀。方圆数里，只有老丙一个杀猪的，所以很长一段时间，在我浅薄的认知里，杀猪的不是一种职业，而是老丙。老丙沉默寡言，不经意间，手起刀落，分割下一条长长的猪肉，斤两八九不离十。然后，老丙迅速地案板上抽出几根稻草，拴到猪肉上，打个结

鸡鸣声声——这声音，让我回味那苦涩的时光里含泪的微笑。

我上初中那会儿，村庄附近一个药材站要收一种叫菖蒲根的药材。妈妈听说后，组织我们兄弟一起去挖。那天凌晨，雄鸡才叫了一声，妈妈就喊起了我们兄弟几个，爬过一座又一座山，快到地方了，天还黑着。大家正纳闷呢，邻村的鸡才开始叫第二遍。妈妈笑着说：坏了！我们起得太早了，好像才过四更哪。我们兄弟几个也不禁哈哈大笑。只好在一片竹林的空地里，烧了一堆火，大家围坐在一起等着。

一直等到鸡啼第三遍，天刚破晓，我们就起身去找菖蒲。我们在山上一条小溪边找了半天，完全找不到菖蒲的影子，几乎绝望。正垂

头丧气，妈妈让我们到下游继续找，劝我们不要放弃。约莫找了半个小时，只听小弟在喊：“找到了！找到了！”大家一窝蜂冲过去，果然发现大片大片茂盛的菖蒲，青翠欲滴，长满了一河沟。大家兴奋不已，仿佛发现了一座金矿。妈妈指挥我们分片去挖。我也忘了饿和累，沮丧的情绪一扫而光，中午也没有休息，一直干到太阳落山。回去的路上，大家有说有笑，一路高歌，挖了这么多菖蒲根，全部加一块，估计能挣十几块钱哪，在我们这样一个没有一点经济来源的家庭，挣一块钱都困难，怎能不喜出望外呢？

鸡鸣声声——这声音像号角，激励我在艰难窘迫中坚韧不拔、勇往直前。

红烧肉

张金金

递给我。我一手递钱，一手拿肉，兴冲冲地赶回去。一顿美味的红烧肉，可以暂时慰藉我肚子里按捺不住的馋虫。

尚未实现机械化生产的农村，劳力们身体里最缺的是油，不吃荤油，干不动繁重的农活。红烧肉是最好的营养品，热锅里，肥肉四溢的油脂，滋养了劳力们的身体，助力他们挑起生活的重担。广袤的田野里，一袋袋粮食被扛上独轮车或板车，劳力们步行十几二十里路，将稻谷运到晒场。我们这些小孩跟在大人后面，遇到陡坡，就要上前助力。如果是独轮车，找不到合适的发力位置，加上载货量有限，不需要我们出大力，可以跟在后面偷懒，所以我们更喜欢独轮车。很长一段时间，我有点固执地认为，推独轮车，推车人看着满满的稻谷，浑身充满力量，奋勇向前，无须借助我们这些外力。而拉板车的

人看不到收获，被动负重前行，对我们这些外力就有了依赖。但无论是推独轮车还是拉板车，都离不开劳力们身上的汗水，离不开红烧肉的力量供给。

闲暇时，父辈们会说起他们小时更艰苦的日子里有关红烧肉的故事。逢年过节，家里熬一点猪油，为了防止被偷吃，父母会将猪油藏起来。调皮胆大的孩子，吃饭时，会偷偷挖一勺猪油，藏在碗底，神不知鬼不觉，热饭冷油吃下去，心中暗暗窃喜。这是今天的我们无法理解的。

读大学时，我听说老家桐城有一个关于红烧肉和红头绳的故事。说主人家贫，无钱买肉，但招待亲朋好友又不能失了面子，无奈之下，只能向邻里借肉。为了防止客人吃肉，有借无还，会在红烧肉上系一根红头绳。客人看到红头绳，

上高中时，由于营养不良，我虽长到了一米六七的个头，身体却非常单薄，所以在干体力活时，我比同龄人要付出更多的汗水。

学校放假时，正好赶上生产队要将一批木材运到山下三十多里外的一个小镇，大家先用肩膀扛着八九十斤的木头，在羊肠一样的山路上走十几里，然后几人一组，到大河边把木头扎成木排，撑着木排到小镇。这项工作十分辛苦，不是身强力壮的劳力，不敢接这样的活。因父亲病弱，我自告奋勇领受了这一艰巨任务。

早晨照例起得很早。在鸡鸣声中，我们出发了。走过一座山，涉过一道水，听着村庄里的鸡啼，披着清冷的月色，望着远处模模糊糊的山影，我不由想起了温庭筠的诗句：“鸡声茅店月，人迹板桥霜。”不过此时的景色，我无心欣赏，扛着百来斤的木头，跟着那些劳力们，深一脚浅一脚往前走，既要护着肩上的木头不能掉下来，又要兼顾脚下不能踩空，一路上担心不已。特别是走到陡峭的山路，心儿揪成一把。多少次身体被压得喘不过气来，我感觉自己快不行了，想放弃了。但理智告诉我：必须坚持，否则会给生产队带来多大麻烦呀！于是咬咬牙，继续前行。我总感觉不是身体在支撑我，而是一种责任、一种意志在支撑着我。

终于走到了河边，卸下身上的重担，心里一下子轻松不少。但是走过一段平缓的河道后，河床急剧下降，木排顿时像离弦的箭一样冲了出去。我们搏击在湍急的河流中，多少次差点葬身鱼腹。正是因为有一种精神上的力量在推动着我，才战胜了心理上的怯懦和恐惧，最终安全地走出了恶流险滩。

鸡鸣声声——这是世界上多么富有韵味的声音啊！这声音，虽然离现实越来越远，但它却深深植入我的心里，在那里生根，并在我的梦里开出别样的花朵。

知晓肉是借来的，要原样返还，不能动筷子。艰苦的岁月里，一份红烧肉，是体面的象征。

时光荏苒，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富裕，红烧肉已成为一道家常菜。但很多过惯了苦日子的人，仍然保留着节俭的生活习惯。结束一天的工作，享受丰盛的晚餐，面对一份红烧肉，不敢有丝毫浪费，一定要一扫而光。此时，因缺少繁重的体力劳动，红烧肉日渐造就了我们肥胖的身体，“三高”逐渐成为普遍的慢性病。过去买肉，肥肉价格更高，如果不谙世事的孩童买到了瘦肉和骨头，回家少不了一顿责骂。如今肉贩会对猪肉精细分割，肥肉基本无人问津，瘦肉和骨头，价格会高出很多。

一份红烧肉，见证了时代的变迁、社会的发展，记录了一代人为贫穷而奋斗的岁月。

